

厦门大学细胞生物化学研究室名誉主任、省校合办的抗癌研究中心领导小组组长、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肿瘤细胞工程实验室学术带头人汪德耀教授，是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在国内外生物界享有盛誉。他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忠诚于教育事业，成果累累，桃李满园，堪称楷模。他又是知名的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对政协工作和统一祖国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经历过满清王朝、北洋军阀、中华民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汪德耀教授，1903年2月生于江苏省灌云县一个小职员的家庭里。1921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取中法大学公费赴法国留学。经五年苦读，1925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理学硕士学位；翌年入巴黎大学，在著名的化学胚胎学者万特培尔及细胞学者巴哈博士的实验室进行细胞学胚胎学的研究工作，六年后至1931年秋获法国国授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他的《横口鱼类孵化腺的研究》博士论文，获得诺贝尔奖金

学有方。承嘉老重托、秉萨公推荐，1945年9月他接任厦门大学校长。在前任校长萨本栋增设的机电系基础上，分别设置了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并将理工学院分别设立理学院及工学院。这些新系科的设置，对于战后国家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人才需要，起到重要作用，也为日后厦门大学的生存与发展作出贡献。抗战胜利后，他制定周密计划，发动全校师生员工把厦门大学迁回厦门。还广聘许多名家教授，如王亚南、郭大力、林励儒、郭一岑、卢嘉锡、寿俊良……等到厦大任教或兼院、系领导职务，为把厦大办成“南方之强”作出不懈努力。

厦门解放后，正在英国考察、访问讲学的汪德耀欣喜若狂，电贺厦大获得新生，并缩短在国外讲学考察时间，冒着台湾飞机轰炸的危险，乘船于1950年3月返校任厦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8月，他改任生物系主任，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献给新中国的科教事业。

科教报国

一片丹心

——记细胞生物学家汪德耀教授

厦门大学 白蓝

获得者 Berthelot 的科学研究最高额奖金 2500 法郎。他的导师及情人都挚意留他在法国工作。可是，当时日本军队占领我东北三省，社会垂危。爱情诚可贵，友谊价更高，为挽救祖国故，他毅然回神州。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任教授和研究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生物系主任和教务长。1941年转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兼动物研究所研究员。1943年应聘到厦门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代理校长，除教学外还主持校务工作。当时，日军长驱直入，江西赣州沦陷，厦门大学迁往长汀，随即改为国立。汪德耀审时度势，一方面做好日军突然窜犯的准备，一方面为迎接抗战胜利加紧培养人才。学校规模从原来的三个学院九个系扩大到文、理、法、工、商五个学院十八个系，增设了航空系、海洋系和国际贸易等系，可见他远见卓识、办

从五十年代起，汪教授一直参与制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计划。从六十年代起，他和他领导的科研组一直承担有关细胞器结构和功能以及核质相互关系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研究，在动植物细胞液泡系的演进规律、动物细胞非有丝分裂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他注重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研究牡蛎的人工受精、育苗和大小牡蛎的人工杂交，力求阐明我国养殖海产贝类胚胎发育的规律及其生长发育的条件，解决了养殖海产贝类幼苗紧缺的难题。并在福清蛎蛤养殖场为劳模办培训班，亲自讲课指导实验工作，受到福建省水产厅的高度赞扬。以后，又进行多项富有成果的研究。如1991年初他领导的《甜菊叶片细胞超微结构及甜菊苷形成机理研究》，获得国家科委发给“国家科技成果完成者证书”，专家组评审这项研究从分子水平论证甜菊苷机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解放后到文革前，他发表20多篇有创见性的论

文,得到国内外生物界的好评。

在“文革”浩劫中,他教学科研的权利被剥夺,直到1972年他的人身稍有自由,便潜身科研之中,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主要特征及发展动态》一文,自己花钱印刷100份,分送给各大学和科研单位,向我国细胞生物界敲起晨钟,呼唤祖国科学春天的到来。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汪教授焕发青春。在科研方面又恢复了对北京鸭精子发生过程中细胞骨架和核孔复合体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有的是填补了国际上关于鸟类精子发生过程超微结构研究的空白,某些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汪教授又把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同当前医学上的难题——癌症结合起来,开展了研究癌细胞生物学三大重点课题之一——癌细胞诱导分化问题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被同行专家、中科院院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的空白。鉴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国家批准成立重点专业实验室——肿瘤细胞工程实验室。

从1978年迄今,汪教授科研成果累累,发表论文近50篇。他主编的《普通细胞生物学》,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细胞生物学实验指导》,此书已发行六十多万册。1989年他主编《细胞生物学超微结构图谱》。1995年,他和洪水根编著的《膜分子生物学》,获名家学者高度评价。1981年汪教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61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已招十六届研究生,已毕业的硕士生60多名、博士生4名,现仍带几届博士生。他常说:老一辈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要争分夺秒地发挥作用,但“四化”大业终归会落在年青人肩上。因此,他对教师队伍建设和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倾注心血,不遗余力,严格要求,热情鼓励,精心指导,建议领导选派中青年教师和优秀研究生毕业后出国深造,并甘为人梯尽力扶持年青教师挑起教学、科研重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学校教职工生活疾苦挂在心上,亲自写信面呈李鹏总理请求尽快解决厦大教职工有关特区补助等问题,引起国务院重视,使问题逐步获得解决,备受群众赞扬。

为促进国际校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汪老不顾年迈、辛劳,奔波于美、英、法、日本和加拿大等国之间。为建立厦大与法国尼斯大学、美国克罗拉多大学的校际合作及纽约《Alton Jones Cell Science Center》协作做出贡献。1989年他被尼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93年11月应台湾“中央研究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的邀请赴台进行三周的参观访问和学术报告,产生很大影响。

1992年金秋,厦门大学为庆祝汪老从事教学科研六十周年暨九秩华诞举行庆祝大会时,他激动地说:“驱使我一生不懈进取、努力拼搏的动力:一是热爱祖国,二是热爱科学。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正在英国访问和讲学的我,心里非常激动,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教育重视科学,对知识分子倍加爱护……所有这一切,我都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由此,我感到社会主义祖国越来越可爱。同时我也认识到,热爱祖国应有一个深刻的新的含义,这就是热爱祖国必然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另一个动力是热爱科学。大家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掌握科学知识的科学工作者却应该有他自己的祖国,应用其所学来报效他的祖国。大家祝贺我九十寿辰,我的人生指标在“四人帮”肆虐年代想活到一百岁,今天我还想活到一百二十岁。现在,我愿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再添砖加瓦……。”

汪老不仅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科教事业,关心厦大的发展,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他现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常委,四十多年来担任福建省政协常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克尽职守,积极参政议政。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给他的贺信中指出:“长期以来,汪老与我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努力奋斗,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原省委副书记胡宏同志给汪老的贺信中深情地说:“作为德高望重的知名长者,您自觉以国家振兴、民族崛起为己任,几十年奔波操劳,尽心尽力,为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以及海峡两岸的沟通,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不懈努力”。1989年福建省政府授予他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1990年他被国务院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美国名人传记研究院发给他金质奖章框名人证书,称他为中国细胞生物学的创始人和发展者。1995年8月这个传记研究院又授予他“国际名人文化荣誉证书(第343)”。此外,他又被美国《BESO生物研究中心》聘为高级科学顾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卢嘉锡衷心祝贺他:“老骥伏枥壮志未已,九旬寿星再立新功”。

青松不老,斯人长健,四海嘉庚学子,五洲厦大校友共颂我汪公。